

草婴的翻译思想与翻译精神

许宗瑞

(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36)

摘 要:中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在长达六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中形成了以翻译艺术观、风格融合论、形象生动说为核心的翻译思想,铸就了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追求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为特征的翻译精神。其翻译思想与翻译精神,是中国翻译史上一笔不朽的宝贵财富,值得广大翻译工作者学习、继承、发扬。

关键词:草婴;翻译思想;翻译精神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16) 02-0151-06 **引用页码:** 040302

2015年10月24日,中国一代文学翻译大师陨落,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草婴先生在上海与世长辞。当晚,国务院前总理温家宝同志即向草婴夫人盛天民女士写去了悼念信函。在信函中,温总理指出,“草婴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文学家、翻译家,他的成就、品格和精神值得我们纪念、学习、传承。他的为人和作品将永远留在人间。”^[1]短短数十言,不仅凝练了温总理对草婴在文学、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就的高度评价,也饱含着他对草婴学识学养、品格德行的高度赞扬。中宣部、中国外文局、中国译协等部门和组织也纷纷致电哀悼草婴逝世。中国译协在唁电中赞扬草婴“为中国翻译事业和中俄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翻译界享有崇高声誉,受到中国翻译界的敬重和爱戴,是我国翻译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杰出代表”^[2]。草婴的确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的一座丰碑,一面旗帜,他的离去是中国翻译界、文学界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我们在哀伤悲痛之余,有必要对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翻译生涯中形成的宝贵翻译思想与翻译精神进行梳理,继而继承、发扬,这不仅是告慰和纪念他的一种方式,也将对广大翻译工作者有着重要的参考、启迪和指导意义。

一、草婴的翻译思想

草婴,原名盛峻峰,1923年生,浙江宁波人,少年时期开始学习俄语,从此与这种语言结下了不解

之缘。他曾凭一己之力,投入二十余年的时间将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译成中文,此外还翻译了肖洛霍夫、莱蒙托夫、卡塔耶夫、尼古拉耶娃等前苏联著名作家的作品。他的文学译介活动不仅得到了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重视,也为他后来赢得了“高尔基文学奖”“彩虹翻译奖”“高尔基奖章”“翻译文化终生成就奖”“上海文艺家终生成就奖”等国内外一系列举足轻重的文学与翻译奖项。与几乎等身的译著相比,草婴就翻译本身发表或提出的系统论断不算太多,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笔者通过对草婴本人或与之有关的访谈、回忆、研究等资料的梳理,对其翻译思想进行了总结。草婴的翻译思想,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翻译艺术观、风格融合论、形象生动说三个方面。

(一)翻译艺术观

自古以来,人们对翻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西方如此,中国亦然。古罗马时期,西方学者在此问题上就已形成了“语文学派”和“文艺学派”的分野。在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家也触及了这一问题。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一论争正式拉开序幕。50年代后,随着费道罗夫、奈达等人的翻译理论逐渐传入国内,论争愈加激烈,及至80年代末90年代初,形成了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并出现了所谓的“科学派”“艺术派”“科学艺术统

一派”三大“阵营”。这场科学与艺术之争,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当时及后来很多翻译家、翻译工作者对翻译标准、翻译本质等方面的认识和理解,也直接推动了中国译学的建设和发展。草婴本人虽未直接参与这场论争,但围绕这一问题也根据多年从业经历和实践感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翻译有文学与非文学之分,科技翻译、社科翻译、新闻翻译等皆为非文学翻译,小说、诗歌、戏剧等作品的翻译则属文学翻译的范畴。之所以如此划分,草婴的理由是这两种翻译的性质和要求截然不同。非文学翻译一般只需传词达意,内容清晰准确即可,而文学翻译的要求远高于此。对此,他曾作过这样的比喻:“非文学翻译好比照相,照片清楚一看就知道是什么,风景、花卉、人物要求给人以清楚的印象,不清楚走了样就不好。文学翻译就不似照相,它象写生、绘画,要求高于一般照相。十位画家在黄山写生,都画迎客松,画出来的每幅画又相同又不同;水平高的画家要求把意境的美表达出来,这既要技术,又要艺术。”^{[3]10}

对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机器翻译,草婴认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和发展,非文学翻译将来完全可由机器代劳,而文学翻译则永不可能,需要人一字一句翻译,其主要区别在于“文学翻译是艺术性的工作”^{[3]11},而且文学翻译的艺术追求也无止境。草婴还指出,文学翻译是连接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桥梁,译者须从各方面斟酌考量,须把原文作者的精神世界较为完整地传达给译文读者,使之亦能准确体会,一部优秀的文学翻译作品应该是“译文读者读后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后的感受”^{[4]158}。因此在他看来,文学翻译的过程即为一个再创造的过程,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不过这个过程,这种艺术,既受制于时代背景、民族风俗、语言特点等方面的客观差异,又须在一定的框架内进行,“受原作束缚,不能随心所欲”^{[3]11}。

草婴的这种翻译艺术观继承了林语堂等老一辈翻译家的主张,也与同时期傅雷、钱钟书等人的思想相得益彰,彼此呼应,在当时中国翻译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在翻译实践中他也是这种思想的脚踏实地的践行者,其译作的艺术性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一点广为国内学者与读者称道。“自诩为草婴最忠实的读者之一”的冯骥才曾指出,他在阅读草婴译著时常有无法分出译者和原文作者的错觉,感觉“他们好像是一个人”,其译著似乎就是“那些异国大师用中文写的”,进而发出了二者“灵魂相通”“天

性契合”“草婴感动了我几十年”这样的感慨。^[5]章海陵也认为,草婴的译文“分明是有生命力的”,字里行间融入了“自己的文学精魂”,让他不禁想起托尔斯泰说过的那句名言——“在艺术创作中创作者与鉴赏者融成一个共同的‘我’”。^{[4]209}

(二)风格融合论

言及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就不能不提风格问题。风格,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文艺作品中表现出的主要思想特征和艺术特色。文学翻译如若忽视原作风格,将无异于断送原作的艺术生命。因此,风格的再现传达,是文学翻译中必须重视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这种再现传达又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原文作者风格和译者风格之间的矛盾。因为任何一部译作,或多或少都会带上译者的风格印记,不论译者如何强调尊重原文作者,忠于原文作者,这一点无法避免。一些翻译家、学者据此认为这种矛盾不可调和或难以统一,于是提出了风格“不可译”“顺其自然”等论断。

草婴虽不认同此观点,但也认识到其中的复杂性和艰巨程度。他指出,文学翻译中的风格“既有原著作家的风格,又有文学翻译家的风格,可以说是两者加起来形成的风格。原著作家的风格只有一个,但文学翻译家十个就有十种风格”^{[4]158}。尽管如此,他认为可以而且应该采取宽容和开放的态度对待这一矛盾,鼓励不同风格的译本存在,“一种原著,尤其名著,应该容许有不只一个译者来译,让读者自由选择他所喜爱的译本”^{[4]158}。同时草婴还强调,在确定翻译选题时译者除需考虑作品是否具有译介价值外,还要着眼作品是否与自己的风格相近、气味相投,这样才能在翻译过程中更好地切近原作,达到与原作风格的融合、统一。

在风格方面,草婴本人也有所偏好。他曾坦言比较喜欢朴素自然的作品,不太欣赏辞藻华丽的文章,因此不愿尝试那些不合口味的即自认为译不好的作品。至于如何在翻译过程中再现原作风格,他认为必须以识别原文作者的风格为基础:“这种风格是他长期生活和写作逐渐形成的,我们读名家的文章都会清楚地感觉到他独特的风格,而不会跟其他作家混淆。”^{[4]158}此外,草婴还指出风格的再现传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对原文行文特点、精神风貌、气质神韵等方面的理解与领悟。这种理解与领悟“是传达的前提。只有理解领悟了原作的风格,才能想办法传达,而正确传达原作的风格是翻译家首要的任务”^{[4]159}。

草婴关于文学翻译风格再现的阐述以及自己在实践过程中对这一问题的独到处理和把握,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和积极回应。冯骥才曾这样说道,“文学翻译就是这样——如果请汝龙来翻译肖洛霍夫或托尔斯泰,肯定很难达到草婴笔下的豪迈与深邃。甚至无法在稿纸上铺展出托尔斯泰像江河那样弯弯曲曲又流畅的长句子。”^[5]李蟠在品评汝龙和草婴的《复活》译本时则指出,两位译者在再现托翁风格的方法和程度上确实有所不同,汝龙注重原作的词语数量和排列顺序,不随意增删、颠倒,而草婴既注重原文形式又不受其束缚,因此表现出了较强的词语驾驭能力和较高的气质、才华。比如李蟠认为,《复活》中某判断句(此处原文省略)“译为‘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是极其平凡的身世’(汝龙译本9页)就不如‘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极其平凡’(草婴译本8页)好,因为汝译过分拘泥于原文的形式”。^[6]⁵⁶吴桂华在分析草婴的《当代英雄》和《安娜·卡列尼娜》等译本时也指出,草婴文学译著中的语言风格并非“千篇一律”,而是根据原著的语言风格而“各具特点”,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善于自我克制,隐藏个性,努力去模仿和再现原著的语言风格”。^[7]⁴⁵⁸

(三)形象生动说

除风格外,草婴还特别重视文学翻译中的形象问题。形象,广义上讲,是指文艺作品中散发出来的鲜活具体且能激发人们情感情绪的生活图景;狭义上说,指的是文艺作品中人物的神情面貌和性格特征。形象思维,是文艺创作过程中的一种主要思维方式。创作者借助形象反映生活,运用典型化方法和丰富的想象塑造艺术形象,借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同文艺创作一样,文学翻译也与形象思维密不可分。译者需透过原作文字的表层,通过形象思维,感受和理解原文作者塑造的形象,并经过自己的思维重组,尽可能将它们准确地传达出来,以再现原文的独特风姿与美学意蕴,使译文具有同样强烈的魅力和感染力。因此,形象塑造对于作家和译者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这一点,草婴也非常认同。他指出,“人物形象是文学作品的灵魂。作家的水平主要看他塑造人物的能力,翻译家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也要看他用另一种语言重新塑造人物的能力。”^[4]¹⁶⁴而对于文学作品翻译的成功与否,草婴甚至把译文中形象再现是否生动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直译’与‘意译’从‘五四’以来,半个世纪没有人说得清楚,我主张不用这些概念名词。我对文

学翻译的标准,归纳为五句话:一、形象生动,二、动作清楚,三、对话生动,四、节奏明快,五、音调铿锵。”^[3]¹²这样的提法,充分显示了他对文学翻译中形象再现问题的重视。

不仅如此,草婴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再现绝非易事,尤其是在面对一些伟大作家的作品时。就托尔斯泰的小说而言,他说,“托尔斯泰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大师,他的长篇小说更是色彩斑斓、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画廊。我在翻译他的作品时着眼点也是怎样传达他的人物形象,但限于自己的水平,并不总能尽如人意。这也是困难之处。”^[4]¹⁶⁴的确如此,译者是否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是否具有深厚的艺术素养,是否具有良好的形象思维能力,都将影响原作形象再现的传达。因此,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草婴总是“竭力使人物形象在头脑中浮现出来,然后考虑怎样在译文中尽可能清晰地再现,使译文读者也能较好地看到这些形象”^[4]¹⁶⁴。

鉴于形象再现之于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及过程的艰难,草婴非常强调译者自身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强调译者对各国风土人情、人间百态等百科知识的了解、掌握。他说,“读一篇小说后,要看闭起眼睛来书中的人物形象是否能在你头脑中出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外国人的哲学,科学,政治,经济,风格,习惯,日常生活,各种知识都要懂得……如果不懂,形象翻译就比较困难。”^[3]¹⁴⁻¹⁵许钧在对草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他在阅读草婴的《安娜·卡列尼娜》译本时,就深感安娜形象栩栩如生,特别是安娜热恋伏伦斯基时的神态描写,让人读后“难以忘怀”“跃然纸上”“令人神魂颠倒”。^[4]¹⁶³⁻¹⁶⁴章海陵也感慨草婴在《霍斯托托尔》译本中展现出的形象再现功力,尤其是母狼喂食小狼这一情节。译文中母狼“使劲一咳,咳出一大块马肉来”中“咳”字的运用非常“传神”,“不是吐,不是呕,不是呛,不是抖,也不是弹,而是‘咳’”,将母狼本性的凶残与母性的慈祥刻画得淋漓尽致。^[4]²⁰⁸

二、草婴的翻译精神

自从“翻译伦理”一词问世后,人们对“翻译精神”似乎少了不少热情。诚然,在市场化逐渐普及、功利化急剧膨胀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视和审视当前翻译界和翻译行业中广泛存在的各种“不正之风”以及规范、责任等问题,而老一辈翻译家的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关切,值得我们学习。纵观草婴长达六十余年的翻译人生,可以说他始终饱

含着一颗对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追求之心,体现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之情。

(一)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追求

翻阅相关材料便不难发现,不论草婴自己还是他人,在谈论其翻译时提及最多的字眼就是“爱国”与“人道”。这种崇高的追求,应该说贯穿他的翻译生涯始终,给他带来了巨大动力和精神感召。

早在少年时期,草婴就在鲁迅的影响下决心走上翻译救国的道路。当时,《鲁迅全集》的出版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他不仅反复阅读,而且把书借给同学,在同学间传阅。这部“指明了他的生活道路”^{[8]101}的书,尤其是占据其中一半篇幅的译作,不仅让他对异域文化、外国文学产生了殷切向往,更令他对鲁迅“改造社会”这一伟大行为肃然起敬并进而效仿。他说,“我读俄文、英文,走上了从事翻译工作的道路,是受了鲁迅的影响。我认为,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巨人。他无论涉及哪一个领域,都有非常明确的指导思想,其目的就是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变做人的命运。”^{[4]147}

青年时期的草婴,在姜椿芳的引领和鼓励下,正式拿起译笔,冒着生命危险为着自己的这种信念开始了不屈斗争。不论当时在时代社工作还是后来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供职,不论新闻、电讯的翻译还是处女作小说《老人》译本的出版,草婴都将对国家、民族、人民的热爱和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法西斯的憎恨,融入血液,融进译作之中。他曾这样回忆道,“我学习俄语并从事翻译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对正义事业的一股热情……我从事翻译主要是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其次是通过学俄语培养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想为中国读者介绍些优秀的俄苏文学作品。”^{[9]37}

1949年建国后至文革前这段时期,草婴的翻译工作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主题,重在引进苏联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有关作品,以响应新时代来临之际国家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此时他也逐渐意识到国民经济的复苏、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素质的提高,取决于人民思想的升华,因此他还译介了一大批能够凸显人的精神、体现新社会对人的塑造的小说。“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抛弃教条主义的框框、反映人民真实生活”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个人的遭遇》等皆为他在该时期的代表译作。

文革结束后,饱受摧残且已年过半百的草婴开

始认真思考这场悲剧发生的原因,开始探索如何用自己的译笔尽自己之力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托尔斯泰,投向了闪耀人道主义思想和人性光辉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他指出,“通过‘文化大革命’,我越来越清楚,在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这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也是人类无数次浩劫的原因。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9]1}应该说,从开始踏上译途到后来对翻译对象的慎重选择,草婴始终本着国人的需要,“一个有见地的知识分子眼中的国人的需要”^[5],而且后来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变迁以及自己认识的不断深化,他对翻译功用的理解逐渐上升到了事关人类福祉、人类精神向度的高度,因此翻译这种行为在他身上体现出的并非是对他人作品的机械搬运,并非一种借以谋生的手段,而是“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5]。

(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

草婴非常欣赏郑板桥在《竹诗》中写下的诗句^{[10]131},对他而言,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即为他一口“咬定”的“青山”。他曾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我这辈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学翻译。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9]10}这种选择,这种执着,是一种超然物外的淡然与笃定,是对翻译事业全身心投入的专注。文革结束后,某市有关部门曾邀请他出任某大型专业翻译出版社的总编辑,结果他放弃了这次宝贵的升迁机会,并未走上仕途。虽也身兼一些社会职务,但他自始至终都是无编制、无工资、无职称的体制外“三无人员”,仅靠微薄的译酬、稿酬维持生活。不过他始终能安于清贫,安于寂寞。他说,“我把名和利看得很淡……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我在选择翻译选题上可以更自由些。”^{[9]10}就这样,怀有“一种忘我的虔诚态度和傻子精神”的草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终日与译笔为伍,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与青灯为伴。草婴每日的翻译速度并不快,基本在千字左右,这主要是因为他对译作质量的苛求,“用字字推敲,皓首穷经这类词语来表述草婴的文学翻译过程是不为过的”^{[11]287}。

另外,草婴的这种选择,这种执着,也是一种百折不回的坚劲和强韧。这一点,从他对自己译著署名由来的解释中便可窥见一斑:“小草是渺小的,很容易被人践踏,也很容易被火烧掉。但是春风一吹,又会重新恢复生命力。‘婴’呢,就是比草更小,草的婴

儿。我觉得我们应有这样的精神,尽管我是很普通、很渺小的人,但我很坚强,不会屈服任何压力。”^{[9]42}的确如此,草婴犹如白居易诗中原上的离离“小草”,犹如郑板桥笔下立根破岩的“坚竹”,在翻译道路上从未向任何挫折低头,向任何磨难弯腰。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破裂,国内文化界开始对“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肖洛霍夫进行批判。文革开始后,草婴作为肖氏作品在国内首位且是最重要的译者,很快就被扣上了肖氏“鼓吹手”“代言人”的帽子,成为最早被冲击的对象。文革十年,挨批斗,被抄家,遭监禁,草婴的身心遭受了无数次摧残与蹂躏,但即便经历了两次生死攸关的劫难,他也不忘初心。1969年,他因强体力劳动致使十二指肠大出血,经过抢救后虽保住了性命,但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1975年,同样由于繁重劳动导致胸椎压缩性骨折,结果因无资格就医在木板上一动不动躺了足足半年。面对如此遭遇,草婴心中想到是仍是坚持,仍是对翻译事业的坚守。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他说,“我当时就这样想,千方百计要忍住,要过这个关。如果我过不了这个关,就是完全残废,我后半辈子就等于无事可做了,什么翻译都不要谈了。”^{[9]95}后来在翻译《托尔斯泰小说全集》期间,草婴长女身患癌症不幸去世,他同样以极大的毅力强忍悲痛,依然坚持翻译。他认为失去女儿已是巨大的损失,如果因此而搁下译笔,将会是双重损失,他的这种行为“让人看到了他对文学翻译事业的忠诚、执着和奉献精神”^{[12]48}。

三、结 语

翻译者与翻译家,在草婴看来,完全是“两码事”。^{[13]56}20世纪90年代,某市有关部门曾建议该市翻译家协会更名为翻译工作者协会,对此他坚决反对。他认为世上翻译者众多,但翻译家甚少,其原因在于后者经历了文学翻译的千锤百炼,对文学翻译有着深刻的理解,对翻译事业倾注真挚的情感。如上所述,草婴也的确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他对翻译家这一形象的认识与体会。他热爱文学翻译,强调文学翻译的艺术性,重视文学翻译的风格与形象问题,他对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追求之心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之情更是贯穿其翻译生涯始终。在草婴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优秀的翻译家的翻译工作是与人格的力量关联着的”^[14]。草婴健在时,有人就发出了像他这样的“职业翻译家”即将“断种”的呼喊。^{[15]44}草婴去世后,也有人发出了类似感

叹:“像草婴这样的翻译家,在今天或以后,都很难再有了。”^[16]这种呼喊,这种感叹,是对草婴的推崇与缅怀,同时也是对当前翻译界、翻译行业的担忧与不安。斯人已去,译“道”犹存,草婴的翻译思想与翻译精神将永远是中国翻译史上一笔不朽的宝贵财富,值得后辈永远铭记、珍惜。

参考文献:

- [1] 中国译协网. 温家宝同志致函悼念草婴先生逝世[EB/OL]. (2015-10-27) [2015-10-30]. http://www.tac-online.org.cn/ch/tran/2015-10/27/content_8328316.htm.
- [2] 中国译协网. 中国译协致电哀悼草婴先生逝世[EB/OL]. (2015-10-28) [2015-10-30]. http://www.tac-online.org.cn/ch/tran/2015-10/28/content_8331709.htm.
- [3] 艾群. 文学翻译家谈文学翻译:草婴同志在上外作专题报告[J]. 外国语言教学资料报导, 1982(2):10-15.
- [4] 草婴. 我与俄罗斯文学:翻译生涯六十年[M].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
- [5] 冯骥才. 草婴先生瘦小的重[N]. 光明日报, 2011-9-1(13).
- [6] 李蟠. 评《复活》的两个译本[J]. 外国语, 1988(4):54-59.
- [7] 吴桂华. 探翻译中的神似:析草婴的译作[C]//黑龙江省外国语学会. 外语语言教学研究:黑龙江省外国语学会第十次学术年会论文集.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457-463.
- [8] 上海教育出版社. 开卷有益:给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0:101-105.
- [9] 金波, 司徒伟智. 译笔求道路漫漫[M].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
- [10] 柯琳娟, 杜雅萍. 坚守良知的翻译家:草婴传[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11] 余一中. 余一中集[M].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13:286-287.
- [12] 徐振亚. 我所认识的草婴先生[J]. 东方翻译, 2010(4):46-51.
- [13] 马婕. 翻译与艺术在这里融合:访翻译家草婴与他的画家女儿盛姗姗[J]. 上海采风, 2010(4):55-57.
- [14] 陈建华. 如草之青, 如婴之纯:悼草婴先生[N]. 解放日报, 2015-10-30(16).
- [15] 李景端. 呼唤职业翻译家[J]. 出版广角, 1999(9):44.
- [16] 傅小平. 他的翻译背后有大的人文情怀[N]. 文学报, 2015-10-29(3).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Spirit of Cao Ying

XU Zongr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6, China)

Abstract: Cao Ying, a famous Chinese translator of Russian literature, has developed translation thoughts centering on view of translation art, theory on style integration and theory on vividity and created translation spirit characterized by patriotic and humanistic pursuit and persistence in his translation career lasting for over 60 years. His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spirit are immortal precious wealth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which are worth the study,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by translators.

Key words: Cao Ying; translation thoughts; translation spirit

(责任编辑: 任中峰)